

中国科举文化通志 主编 陈文新

《儒林外史》的现代误读

甘宏伟 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湖北省学术著作出版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中国科举文化通志 主编 陈文新

《儒林外史》的现代误读

甘宏伟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儒林外史》的现代误读/甘宏伟著.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5. 12
中国科举文化通志/陈文新主编
ISBN 978-7-307-16926-5

I. 儒… II. 甘… III. 《儒林外史》—小说研究 IV. I207.4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27367 号

责任编辑:陈 帆 责任校对:汪欣怡 版式设计:马 佳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 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14.25 字数: 309 千字 插页: 4

版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16926-5 定价: 72.0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中国科举文化通志》总序

陈文新

(一)

科举是中国古代最为健全的文官制度。它渊源于汉，始创于隋，确立于唐，完备于宋，兴盛于明、清两代。如果从隋大业元年（605）的进士科算起，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被废除，科举制度在中国有整整 1300 年的历史。科举制度还曾“出口”越南、朝鲜等国，扩大了汉文化的影响。始于 19 世纪的西方文官考试制度，其创立也与中国科举的启发相关。孙中山在《五权宪法》等演讲中反复强调：中国的科举制度是世界各国中所用以拔取真才之最古最好的制度。胡适也说：“中国文官制度影响之大，及其价值之被人看重”，“是我们中国对世界文化贡献的一件可以自夸的事”。^①

科举制度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其原因在于，它在保证“程序的公正”方面具有空前的优越性。官员选拔的理想境界是“实质的公正”，即将所有优秀的人才选拔到最合适的岗位上。但这个境界人类至今未达到过。不得已而求其次，“程序的公正”就成为优先选择。“中国古代独特的社会结构是家族宗法制，家长统治、任人唯亲、帮派活动、裙带关系皆为家族宗法制的派生物，在重人情与关系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若没有可以操作的客观标准，任何立意美妙的选举制度都会被异化为植党营私、任人唯亲的工具，汉代的察举推荐和魏晋南北朝的九品官人法走向求才的死胡同便是明证。”“古往今来科举考试一再起死回生的历史说明：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人情社会，人情与关系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为了防止人情的泛滥，使社会不至于陷入无序的状态，中国人发明了考试，以考试作为维护社会公平和社会秩序的调节阀。悠久的科举历史与普遍的考试现实一再雄辩地证明，考试选才具有恒久的价值。”^②从这一角度看，科举制度不但在诞生之初有着巨大的进步意义，而且在整个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都是一个了不起的创造。较之前代的选官制度，如汉代的察举、征辟制和魏文帝时开始推行的九品中正制等，科举制度都更加公正合理。

① 胡适：《考试与教育》，《胡适文集》第 12 册，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08 页。

② 刘海峰：《科举学导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13、136 页。

作为一项从整体上影响国民生活的官员选拔制度，科举制度对于维护我们这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稳定，其作用是无论怎样估计也不会过高的。胡适这位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虽然一再愤愤不平地说到中国文化的种种不是，但在《考试与教育》一文中，他也毫不含糊地指出：在古代那种交通极为不便的情形下，中央可以不用武力来维持国家的统一是由于考试制度的公开和公平。胡适所说的公平，包括三种含义：一是公开考选，标准客观。二是顾及各地的文化水准，录取的人员，并不偏于一方或一省，而是遍及全国。三是实行回避制度，“就是本省的人不能任本省的官吏，而必须派往其他省份服务。有时候江南的人，派到西北去，有时候西北的人派到东南来。这种公道的办法，大家没有理由可以反对抵制。所以政府不用靠兵力和其他工具来统治地方，这是考试制度影响的结果”^①。这些话出于胡适之口，足以说明，即使是文化激进主义者，只要具有清明的理性，也不难看出科举制度的合理性。

作为一项从整体上影响国民生活的官员选拔制度，科举制度不仅具有历史研究的价值，而且有助于我们思考当今人事制度的改革问题。2005年，任继愈曾在《古代中国科举考试制度值得借鉴》一文中提出设立“国家博士”学位的设想。其立论前提是：我国目前由各高校授予的博士学位缺少权威性和公正性。之所以不够权威和公正，不外下述几个原因。其一，“各校有自己的土标准，执行起来宽严标准不一，取得学位后，它的头衔在社会上流通价值都是同等的”，这当然不公平。其二，研究生入学后，第一年大部分时间用在外语上，第二年大部分时间忙于在规定的某种等级的刊物上发论文，第三年忙于找工作，这样的情形，怎么可能培养出货真价实的博士？其三，几乎所有名牌大学都招收“在职博士生”，有的博士研究生派秘书代他上课，甚至不上课而拿文凭，这样的博士能说是名副其实的吗？只有设立“国家博士”学位，采用统一标准选拔人才，这样的“博士学位”才具有权威性和公正性。而国家在高级人才的选拔方面统一把关，不仅可以避免“跑”博士点和博士生扩招带来的许多弊病，有助于社会风气的改善，而且，由于只管考而不必太多地管教，还可以节省大量开支。就这一点而言，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的确是值得参考借鉴的。任继愈的这篇文章现已收入《皓首学术随笔·任继愈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有心的读者不妨一阅。

与任继愈的呼吁相得益彰，早在1951年，钱穆就发表了《中国历史上的考试制度》一文。针对民国年间（1911—1949）人事管理腐败混乱的状况，他痛心疾首地指出：科举制“因有种种缺点，种种流弊，自该随时变通，但清末人却一意想变法，把此制度也连根拔去。民国以来，政府用人，便全无标准，人事奔竞，派系倾轧，结党营私，偏枯偏荣，种种病象，指不胜屈。不可不说我们把历史看轻了，认为以前一切要不得，才聚九州铁铸成大错”^②。钱穆的意思是明确的：参考借鉴科举制度，有助于人事管理的规范化和公正性。1955年，他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进一步指出：“无

① 胡适：《胡适文集》第12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06页。

② 钱穆：《国史新论》，东大图书公司1984年版，第114~115页。

论如何，考试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中一项比较重要的制度，又且由唐迄清绵历了一千年以上的长时期。中间递有改革，递有演变，在历史进程中逐渐发展，这绝不是偶然的。直到晚清，西方人还知采用此制度来弥缝他们政党选举之偏陷，而我们却对以往考试制度在历史上有过上千年以上根柢的，一口气吐弃了，不再重视，抑且不再留丝毫顾惜之余地。那真是一件可诧怪的事。”^① 现代中国的人事管理理应借鉴源远流长的科举制度，这是毫无疑问的。至于如何借鉴，则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二)

作为一项从整体上影响国民生活的官员选拔制度，科举制度以其“程序的公正”为国家选拔了大量行政官员，在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准和维护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稳定方面，发挥了直接而巨大的作用，这是其显而易见的功能；它还有其他不那么显著却同样值得重视的功能，即意识形态功能和人文教育功能：科举制度以其对社会的整体影响力将儒家经典维持世道人心的作用发挥到极致。我们试就此略作讨论。

明清时代有一项重要规定：科举以《四书》《五经》为基本考试内容。这一规定是耐人寻味的。《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是秦汉以来中国传统社会维系人心、培育道德感的主要读物。我们经常表彰“中国的脊梁”，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秦汉以降，“中国的脊梁”大多是在儒家经典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以文天祥为例，这位南宋末年的民族英雄，曾在《过零丁洋》诗中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丹心”，就是蕴蓄着崇高的道德感的心灵。他还有一首《正气歌》，开头一段是：“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身在治世，正气表现为安邦定国的情志；身在乱世，则表现为忠贞坚毅的气节。即文天祥所说：“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1282年，他在元大都（今属北京）英勇就义，事前他在衣带中写下了这样的话：“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四书》《五经》的教诲，确乎是他的立身之本。

文天祥是宝祐四年（1256）状元。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事实。它表明：进士阶层在实践儒家的人格理想方面，其自觉性远远高于社会的平均水平。宋代如此，明代如此，甚至连元代也是如此。清代史学家赵翼曾论及“元末殉难者多进士”这一现象：“元代不重儒术，延祐中始设科取士，顺帝时又停二科始复。其时所谓进士者，已属积轻之势矣，然末年仗节死义者，乃多在进士出身之人。”（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三十《元末殉难者多进士》）接下来，赵翼列举了余阙、泰不华、李齐、李黼、王士元、赵璘、周鏊、聂炳元、刘耕孙、丑闾、彭庭坚、普颜不花、月鲁不花、迈里古思等死难进

^①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89页。

士，最后归结说：“诸人可谓不负科名者哉，而国家设科取士亦不徒矣。”^① 在元末殉难的进士中，余阙（1303—1358）是最早战死的封疆大臣。他的朋友蒋良，一次和他谈起国难，余阙推心置腹地说：“余荷国恩，以进士及第，历省居馆阁，每愧无报。今国家多难，授予兵戎重寄，岂余所堪。然古人有言：‘为子死孝，为臣死忠。’万一不幸，吾知尽吾忠而已。”余阙殉难后，蒋良作《余忠宣公死节记》，开篇即强调说：“有元设科取士，中外文武著功社稷之臣历历可纪。至正辛卯，兵起淮、颍，城邑尽废，江、汉之间能捍御大郡、全尽名节者，守豫帅余公廷心一人而已。”^② 在余阙“擢高科”的履历与他忠勇殉节的人格境界之间，人们确认有其内在联系。无独有偶，《元史·泰不华传》在记叙元末另一著名的死节之臣泰不华（1305—1352）时，也着重指出：其人生信念的基本依据是他作为“书生”所受的儒家经典教育。在与方国珍决战前夕，泰不华曾对部从说过一番词气慷慨的话：“吾以书生登显要，诚虑负所学。今守海隅，贼甫招徠，又复为变。君辈助我击之，其克则汝众功也，不克则我尽死以报国耳。”“书生”“所学”与捐躯“报国”之间关系如此密切，足见以《四书》《五经》作为基本考试教材的科举制度，它在维持世道人心方面的作用的确是巨大而深远的。

儒家经典维持世道人心的功能不仅泽及宋元，泽及明清，甚至泽及已经废除了科举制度的现代。其实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原因在于，不少现代名流的少年时光是在科举时代度过的，他们系统地受过这种教育，耳濡目染，其人生观在早年即已确立并足以支配一生。儒家经典的生命力由此可见。科举制度的余泽亦由此可见。

这里我想特别提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并有意多引他的言论。之所以关注他，是因为，世人眼中的胡适，只是一个文化激进主义者，以高倡“打倒孔家店”著称。人们很少注意到，胡适在表面上高呼“打倒孔家店”，但在内心里仍对孔子和儒家保留了足够的敬意，是儒家人生哲学的虔诚信奉者和实行者。唐德刚编译《胡适口述自传》，第二章有胡适的如下自白：“有许多人认为我是反孔非儒的。在许多方面，我对那经过长期发展的儒教的批判是很严厉的。但是就全体来说，我在我的一切著述上，对孔子和早期的‘仲尼之徒’如孟子，都是相当尊崇的。我对十二世纪‘新儒学’（Neo-Confucianism）（‘理学’）的开山宗师的朱熹，也是十分崇敬的。”“在这场伟大的‘新儒学’（理学）的运动里，对那（道德、知识；也就是《中庸》里面所说的‘诚则明矣，明则诚矣’的）两股思潮，最好的表达，便是程颐所说的：‘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后世学者都认为‘理学’的真谛，此一语足以道破。”同一章还有唐德刚的一段插话：“‘要提高你的道德标准，你一定要在‘敬’字上下功夫；要学识上有长进，你一定要扩展你的知识到最大极限。’适之先生对这两句话最为服膺，他老人家不断向我传教的也是这两句。一次我替他照相，要他在录音机边作说话状，他说的便是这两句。所以胡适之先生骨子里实在是位理学家。他反对佛教、道教乃至基督教，都

① 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劄记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06页。

② 杨讷等编：《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中编第一分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68页。

是从‘理学’这条道理上出发的。他开口闭口什么实验主义的，在笔者看来，都是些表面账。吾人如用胡先生自己的学术分期来说，则胡适之便是他自己所说的‘现代期’的最后一人。”^① 胡适是在少年时代接受儒家经典教育的，在经历了废止科举、“打倒孔家店”等种种变故后，儒家的人生哲学仍能贯彻其生命的始终，由此不难想见，在中国传统社会尤其是科举时代，儒家经典对社会精神风貌的塑造可以发挥多么强大的功能。虽然生活中确有教育目标与实际状况两歧的情形，但正面的成效仍是不容忽视的。

“精神文明”是中国人常用的一个概念。“精神文明”是相对物质文明而言的，就个人而言，需要长期的修养，就民族而言，需要长期的培育。中国古人对这一点体会很深，所以常常强调“潜移默化”，经由耳濡目染的长期熏陶，价值内化，成为一种道德规范。如果这种道德规范大体近于人情，既“止乎礼义”而又“发乎性情”，它对社会的稳定，对人类精神境界的提升，都将发挥重要作用。这就是文化的功能。目前教育界所说的“深厚的人文知识素养，有助于塑造高尚的精神世界，提高健康的审美能力”，与这个意思是相通的。《四书》《五经》作为科举时代的基本读物，人文教育功能是其不容抹杀的价值，并因制度的保障而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美国学者罗兹曼认为：科举制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居于中心的地位，是维系儒家意识形态和儒家价值体系正统地位的根本手段。科举制在1905年被废止，从而使这一年成为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其划时代的重要性甚至超过辛亥革命；就其现实和象征性的意义而言，科举革废代表着中国已与过去一刀两断，这种转折大致相当于1861年沙俄废奴和1868年的日本明治维新后不久的废藩。^② 罗兹曼的意见也许是对的。而我想要补充的问题是：在科举制废止之后，如何保证《四书》《五经》的人文教育功能继续得到发挥？

(三)

科举制度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科举制度对现代中国的发展更有足资借鉴的意义。整理与研究历代科举文献，其意义也需要从历史与现实两个角度加以说明：一方面是传承文化，传承文明，让这份丰厚的遗产充分发挥塑造民族精神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去粗取精，古为今用，让它在现实的中国社会重放异彩，成为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智力资源。这是我们编纂出版《中国科举文化通志》的初衷，也是我们不辞劳苦从事这一学术工作的动力。

《中国科举文化通志》重点包括下述内容：

1. 整理、研究反映科举制度沿革、影响及历代登科情形的文献。

① 胡适：《胡适文集》第1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18、433页。

② [美] 吉尔伯特·罗曼兹主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中国的现代化》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35、635页。

从《新唐书》开始，历代正史多有《选举志》。历代《会要》、《实录》、《纪事本末》等史传、政书之中，相当一部分是关于科举制度沿革的资料。还有黄佐《翰林记》、陆深《科场条贯》、张朝瑞《明贡举考》、冯梦祯《历代贡举志》、董其昌《学科考略》、陶福履《常谈》等一批专书。历代《登科录》和杂录类书籍，也保存了大量关于科举的材料。唐代登科记多已散亡佚，有清代徐松的《登科记考》可供参考。宋元登科记保存稍多，明清有关文献尤为繁富。

2. 整理、研究与历代考试文体相关的教材、试卷、程文及论著等。

八股文是最引人注目的考试文体。八股文集有选本、稿本之分。重要的选本，明代有艾南英编《明文定》、《明文待》，杨廷枢编《同文录》，马世奇编《澹宁居文集》，黎淳编《国朝试录》等；清朝有纪昀《房行书精华》，王步青编《八法集》；还有《百二十名家集》，选文3000篇，以明代为主；《钦定四书文》，明文4集，选文480余篇，清文1集，选文290余篇。稿本为个人文集。明清著名的八股大家，如明代的王鏊、钱福、唐顺之、归有光、艾南英，清代的刘子壮、熊伯龙、李光地、方苞、王步青、袁枚、翁方纲等人，均有稿本传世。相关著述数量也不少。清梁章钜《制义丛话》等，是研究八股文的重要论著。其他考试文体，如试策、试律等，也在我们关注的范围之内。这些科举文献，一般读者不易见到，或只能零零星星地见到一些，或虽然见到了也难以读懂，亟待系统地整理出版，以供研究和阅读。

《中国科举文化通志》包括以下数种：《历代制举史料汇编》、《历代律赋校注》、《唐代试律试策校注》、《八股文总论八种》、《七史选举志校注》、《四书大全校注》、《游戏八股文集成》、《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明代状元史料汇编》、《钦定四书文校注》、《翰林掌故五种》、《贡举志五种》、《〈游艺塾文规〉正续编》、《钦定学政全书校注》、《梁章钜科举文献二种校注》、《〈清实录〉科举史料汇编》、《二十世纪科举研究论文选编》、《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礼部韵略〉与宋代科举》、《元明科举与文学考论》、《游戏八股文研究》、《明代八股文选家考论》、《唐代科举与试赋》、《〈儒林外史〉的现代误读》、《科举废止前后的晚清社会与文学》等。我们这套《中国科举文化通志》，以涵盖面广和分量厚重为显著特征，可以从多方面满足阅读和研究之需。而在整理、研究方面投入的心力之多，更是有目共睹。我们的目的是为推进学术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中国科举文化通志》是一项规模宏大、任务艰巨、意义深远的大型出版文化工程。编纂任务主要由武汉大学专家承担，并根据需要从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厦门大学、华中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扬州大学、中南民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高校或科研院所聘请了若干学者。南京大学卞孝萱先生、中华书局傅璇琮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邓绍基先生等在学术上给我们提供了若干指导；参与这一工程的各位专家不辞辛苦，努力工作，保证了编纂进度和质量；武汉大学出版社鼎力支持《中国科举文化通志》的出版；所有这些，我们将永远铭记在心。

2015年4月13日

于武汉大学

目 录

引言	1
一、“误读”研究：异于“研究综述”的学术史研究方式	2
二、关于“误读”	6
三、“语境”与“意义”	12
第一章 论对吴敬梓思想的误读	16
一、“吴敬梓与魏晋风度”辨	16
1. “吴敬梓与魏晋风度”之命题及相关话语的检视	16
2. 站在《儒林外史》的立场看魏晋风度	22
二、论“吴敬梓与儒家”	35
1. 关于“吴敬梓与正统儒家”	35
2. 吴敬梓的思想以原始儒家为根基并兼采诸儒	40
3. 附论“进步与局限”的批评模式	43
三、从《儒林外史》看吴敬梓对待程朱的态度	45
1. 从《儒林外史》的立场看“存天理”、“灭人欲”	45
2. 王玉辉父女形象的历史语境及叙述意向	50
第二章 论对吴敬梓知识背景的误读	67
一、胡适看“吴敬梓与颜李学派”	67
1. 胡适提出并求证“吴敬梓与颜李学派”的命题	68
2. 由“小心”的求证到“大胆”的结论	71
3. 附论当代学者对吴敬梓与颜李关系的考证	78
二、从《儒林外史》看“吴敬梓与颜李学派”	82
1. 《儒林外史》推重道德文行而非功名事业	82
2. 《儒林外史》与颜李学派对于科举的不同关注	99
3. 《儒林外史》与颜李学派视野中的程朱之学	108
三、“四书五经”与吴敬梓的知识背景	118

1. 从《儒林外史》看“四书五经”	119
2. 《儒林外史》与《文木山房诗说》	125
四、由《文木先生传》引出的两个命题	137
1. 从《文选》等看《儒林外史》	137
2. 《儒林外史》与唐人小说	144
第三章 论对《儒林外史》基本立场的误读	154
一、“反科举”话语的考察与辨析	154
1. “反科举”话语的生成与复述	154
2. “反科举”话语与历史的实际情景——以黄宗羲、顾炎武等 关于科举的言论为例	160
3. 关于吴敬梓“嫉时文士如讎”	169
4. “反科举”话语对《儒林外史》基本意旨的遮蔽——以虞博士为例	173
二、《儒林外史》关注科举社会的读书人而非科举制度	175
1. 从《儒林外史》看科举社会读书人的精神心态	175
2. 从《儒林外史》看科举社会读书人的道德文行	194
三、《儒林外史》与两部关涉科举之小说的比较	198
1. “公心”与“孤愤”：从《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看举业	199
2. “讽世”与“谑世”：从《儒林外史》、《镜花缘》看举业	203
结语	206
主要参考文献	210
后记	216

引言

1935年，鲁迅先生在《叶紫作〈丰收〉序》里，曾就《儒林外史》这部小说发出“伟大也要有人懂”^①的感叹。“懂”，这是研读一部书最基本的要求，不过，要真正读“懂”一部书，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且不说达到“忖度予心，百不失一”而为作者“知己”的境界，^②即便做到不与作者创作意向、文本内蕴相悖，在很多时候已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情了。仅就《儒林外史》而言，从吴敬梓生前直至现在，有许多人仔细读过它，也有不少学者倾心研究它，其间产生了很多真知灼见，但也出现了不少与《儒林外史》的文本内容相悖乃至比附、歪曲的看法。尤其是20世纪初以来，“误读”更是成为《儒林外史》研究与评论中的重要现象。由此，如果研究《儒林外史》的现代学术史，就不能不对其间存在的“误读”现象作深入的思考；如果研究《儒林外史》，也不能不对被“误读”的命题作细致的辨析。要做到这些，“误读”研究是一种可以采取的，具有明显优势的方式。在对《儒林外史》的现代“误读”进行讨论之前，有必要先对“误读”研究这一学术史研究方式以及“误读”这一概念作些辨析与界定，同时阐明我们基本的研究立场和研究方法。这些都是我们讨论《儒林外史》现代“误读”的重要基础。

① 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8页。

② 孔尚任在《桃花扇本末》中说：“读《桃花扇》者，有题辞，有跋语……又有批评，有诗歌，其每折之句批在顶，总批在尾，忖度予心，百不失一，皆借读者信笔书之，纵横满纸，已不记出自谁手。今皆存之，以重知己之爱。”（孔尚任：《桃花扇》卷首，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7页。）其实，早在《列子》里就有与孔尚任所云“忖度予心，百不失一”相同境界的表达。《列子·汤问篇》这样记载伯牙鼓琴与钟子期听琴的故事：“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钟子期必得之。伯牙游于泰山之阴，卒逢暴雨，止于岩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为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钟子期辄穷其趣。伯牙乃舍琴而叹曰：‘善哉，善哉，子之听夫！志想象犹吾心也。吾于何逃声哉？’”（杨伯峻撰：《列子集释》卷五，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78页。）到了明代，冯梦龙《警世通言》又将其演绎为“俞伯牙摔琴谢知音”的话本。《列子·汤问篇》中所称“伯牙所念，钟子期必得之”，“曲每奏，钟子期辄穷其趣”，“志想象犹吾心也”等语，都显示出古人对作品欣赏过程中“懂”的境界的追求。

一、“误读”研究：异于“研究综述”的学术史研究方式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现代学术研究在各个领域不断生长,如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新的进展,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问题。这就需要不断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与回顾,而“研究综述”(或“研究述评”)就成为一种基本方式。对于《儒林外史》研究这一领域而言,也产生了不少对其研究状况作综述与评价的文章和著作。这些文章、著作分别选择不同的侧重点对《儒林外史》的现代学术史进行了总结。例如,陈美林的《略评胡适对〈儒林外史〉的研究》、《吴敬梓研究资料的发掘和利用》、《发掘和利用吴敬梓研究资料的再检讨》,黄岩柏等的《李汉秋研究〈儒林外史〉成果综评》,傅正谷的《李汉秋的〈儒林外史〉研究》^①等文章,是专就某一位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述评。再如,陈美林的《对〈儒林外史〉思想主题的不同评价》、《20世纪〈儒林外史〉主题探讨之回顾》、《〈儒林外史〉研究三题》、《吴敬梓思想研究述评》,李汉秋的《〈儒林外史〉研究方法述评》,傅文炎的《吴敬梓〈文本山房诗说〉研究述评》^②等文章,则就某一专题的研究状况作述评。又如,傅继馥的《新的突破在酝酿中——近三年来〈儒林外史〉研究述评》,胡益民的《近年〈儒林外史〉研究综述》,阮文兵的《近十年〈儒林外史〉研究概述》,胡金望的《一九九〇年以来〈儒林外史〉研究综述》,吴波等的《90年代〈儒林外史〉研究述评》,李韵等的《新时期〈儒林外史〉研究综述》,吴波的《辛亥革命以迄40年代〈儒林外史〉的评论及研究》等文章,^③评述了某一较短时段《儒林外史》研究的状况。又如,陈美林的《〈儒林外史〉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署凌昕)、《20世纪〈儒林外史〉研究的回顾》,

① 陈美林:《略评胡适对〈儒林外史〉的研究》,载《南京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吴敬梓研究资料的发掘和利用》,载《文史新澜》,浙江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发掘和利用吴敬梓研究资料的再检讨》,载《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黄岩柏等:《李汉秋研究〈儒林外史〉成果综评》,载《宁波师院学报》1988年第2期。傅正谷:《李汉秋的〈儒林外史〉研究》,载《光明日报》1993年3月31日。

② 陈美林:《对〈儒林外史〉思想主题的不同评价》,载《语文导报》1985年第7期;《20世纪〈儒林外史〉主题探讨之回顾》,载《中华文化论坛》2001年第3期;《〈儒林外史〉研究三题》,载《明清小说研究》2002年第1期;《吴敬梓思想研究述评》,载《中华文化论坛》2002年第3期。李汉秋:《〈儒林外史〉研究方法述评》,载《文学遗产》1986年第1期。傅文炎:《吴敬梓〈文本山房诗说〉研究述评》,载《古典文学知识》2002年第6期。

③ 傅继馥:《新的突破在酝酿中——近三年来〈儒林外史〉研究述评》,载《安徽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胡益民:《近年〈儒林外史〉研究综述》,载《文史知识》1986年第1期。阮文兵:《近十年〈儒林外史〉研究概述》,载《许昌师专学报》1993年第4期。胡金望:《一九九〇年以来〈儒林外史〉研究综述》,载《明清小说研究》1997年第1期。吴波等:《90年代〈儒林外史〉研究述评》,载《怀化师专学报》2001年第1期。李韵等:《新时期〈儒林外史〉研究综述》,载《文史知识》2001年第11期。吴波:《辛亥革命以迄40年代〈儒林外史〉的评论及研究》,载《怀化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许建平的《20 世纪〈儒林外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①等文章，对近百年《儒林外史》的学术研究史进行了总结。李汉秋著《儒林外史研究纵览》，李忠明等著《〈儒林外史〉研究史》^②更是对吴敬梓生前直至当代的《儒林外史》研究状况进行了全面的梳理与总结。此外，一些古代小说辞典、古代小说研究史等方面的书，如李汉秋主编《儒林外史鉴赏辞典》，陈美林主编《儒林外史辞典》，黄霖等著《中国小说研究史》，齐裕焜等著《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黄霖、许建平等著《20 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小说卷）》，李汉秋等著《儒林外史鉴赏辞典》，^③ 等等，也都辟有章节对《儒林外史》的现代学术史进行回顾与总结。

尽管这些“研究综述”或“研究述评”类的文章与著作所采取的角度各有不同，所涉及的范围也有大小，但都表现出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一是求“全”，即皆力求对所涉及范围内的研究成果作尽可能全面的整理与把握。如傅继馥的《新的突破在酝酿中——近三年来〈儒林外史〉研究述评》主要选择 1979—1981 年这一时段的《儒林外史》研究状况进行述评，时段虽短，却也涵盖主题思想、人物形象、讽刺艺术、语言、结构及版本、作者生平思想等方面，并将这三年时间内的主要研究观点、存在的争议等尽可能地述及全面。又如陈美林的《20 世纪〈儒林外史〉主题探讨之回顾》是依专题进行述评，文章详细梳理与总结了 20 世纪初以来《儒林外史》主题研究方面的成果，力求涵盖全部关于主题研究的观点、看法。至于一些长篇论文或专著更是力求搜罗齐备。二是重“述”，即注重对学术史进行叙述与介绍、回顾与总结。突出表现为，论者经常按一定的逻辑结构列述既有的学术观点、看法等。三是重“判”，这些“研究综述”、“研究述评”类的文章或著作也经常要对所述研究成果作出评价，但主要是对其外在的学术意义与价值、成就与不足等进行判断。总之，立足于某一专题或某一时段，尽可能全面地回顾与总结既有的学术成果、学术观点，并对其作价值、意义等方面的评判，是“研究综述”（或“研究述评”）这种学术史研究方式的追求，也可以说是其所长。

但是，学术史研究不止是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回顾与总结，还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方面，通过“研究综述”或“研究述评”这种方式是很难解决的。比如，“研究综述”或“研究述评”不能专注于某几个学术命题，对其来龙去脉作深入细致的梳理；“研究综述”或

① 陈美林：《〈儒林外史〉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署凌昕），载《文史知识》1996 年第 11、12 期；《20 世纪〈儒林外史〉研究的回顾》，载《东南大学学报》1999 年第 4 期。许建平：《20 世纪〈儒林外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4 年第 3、4 期。

② 李汉秋：《儒林外史研究纵览》，天津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李忠明等：《〈儒林外史〉研究史》，海峡文艺出版社 2006 年版。

③ 李汉秋主编：《儒林外史鉴赏辞典》，中国妇女出版社 1992 年版。陈美林主编：《儒林外史辞典》，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黄霖等：《中国小说研究史》，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齐裕焜等：《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黄霖、许建平等：《20 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小说卷）》，东方出版中心 2006 年版。李汉秋等：《儒林外史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1 年版。

“研究述评”不能对学术论点发生的相关背景作过多的关注，因此其反思也多针对学术观点本身，而难以对观点产生与被复述的学术生态进行深入的考察分析；“研究综述”或“研究述评”往往注重对学术研究的成就或不足从意义或价值方面进行评判，但不能展开对学术观点自身的辨析，等等。而对于“误读”研究来说，这些正是其可以有所作为的方面，也可以说是其应当面对和解决的方面。因为“误读”研究正是以被“误读”的命题为关注焦点，以作品文本及相关文本的内容为根本依据，对有关学术观点进行细致辨析，说明“误读”之所以为“误读”的原因，并揭示“误读”现象发生的思想文化背景与学术生态等内容，进而凸显学术史递嬗的轨迹。

其实，文学作品的“误读”现象并不是现代才有的，在古人那里就有很多“误读”的情形。如宋代沈括《梦溪笔谈》卷二十三《讥谑》篇就有这样的评点文字：“白乐天《长恨歌》云：‘峨眉山下少人行，旌旗无光日色薄。’峨眉在嘉州，与幸蜀路全无交涉。杜甫《武侯庙柏》诗云：‘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四十围乃是径七尺，无乃太细长乎？防风氏身广九亩，长三丈；姬室亩广六尺，九亩乃五丈四尺，如此，防风之身乃一饼馐耳。此亦文章之病也。”^①这代表了古人“误读”文学作品的一种情形。但总的来说，古人对文学作品的“误读”通常表现为个体现象，20世纪初以来对古代文学作品的“误读”则呈现整体性的特征，从而构成了“一个重要文化现象”，也构成了“一个重要学术现象”。^②也正因为这一点，对古代文学作品的现代“误读”现象进行研究，从而实现对现代学术史的深入思考就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尽管“误读”的现象早已有之，古代文学作品的现代“误读”也已近百年，但对这种现象作学术上的关注则基本上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自此以后，对“误读”现象的讨论逐渐增多，论者或者着眼于对被“误读”的命题进行分析辨正，或者侧重于对某些“误读”现象进行述评，或者致力于对某些“误读”现象发生的原因进行揭示，或者着重于对某些“误读”的意义进行阐发，产生了不少研究成果。仅从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领域而言，讨论《水浒传》、《红楼梦》“误读”的较多。关于《水浒传》“误读”研究的文章，如刘学明的《〈水浒〉与〈水浒〉的误读》分析了读者对小说中血腥场面发生误读的社会文化心理，刘书成的《时代的错位，荒谬的误读》对现代有些读者热衷于称说“武松爱上潘金莲”这一现象所体现出的误读心理进行了探讨，李友桥等的《〈水浒〉：被误读的文本》关注小说所表现的主旨被误读的问题，尹缉熙的《金圣叹“独恶宋江”论》分析金圣叹误读《水浒》的原因及意义，张同胜的《关于〈水浒传〉误读误解问题的探讨》着重揭示《水

① 沈括著，胡道静校证：《梦溪笔谈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29~730页。

② 陈文新先生在《“中国古典名著的现代误读”丛书总序》中指出：“‘中国古典名著的现代误读’，这是20世纪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也是20世纪的一个重要学术现象。”（陈文新：《〈红楼梦〉的现代误读》，齐鲁书社2008年版，第6页。）

浒传》遭误读的多方面原因,等等。^①关于《红楼梦》“误读”研究的文章,白盾的《误读红楼二百年》着重探讨钗黛关系被误读的情形及缘由,李根亮的《清代红楼戏曲:文本意义的接受与误读》关注清代红楼戏曲对《红楼梦》文本的误读,王薇的《“他者”眼中的怡红公子》、王燕的《宝玉何以被误读为女士》讨论贾宝玉形象在跨文化接受过程中产生的误读现象,等等。^②关于《儒林外史》“误读”研究的文章,也有欧阳健的《“讽刺”与“谴责”的错位与误读》讨论《中国小说史略》对《儒林外史》及晚清小说分别作“讽刺”、“谴责”之界定而产生的误读,陈尚敏的《〈儒林外史〉与科举:误解及其他》分析现代社会对《儒林外史》中科举内容误读的实质及背景,等等。^③此外,还先后有王立的《中国古代海外传说误读的文化成因》、王洪泽的《“神化”的实质是“误读”——对〈镜花缘〉中妇女观念的再认识》、吕贤平的《论论语堂〈中国传奇〉对古典小说的“误读”及所蕴含之思想》、邱景源的《晚清“政治小说”误读现象研究》、蒋玉斌的《清代“聊斋戏”对〈聊斋志异〉的正读与误读》^④等文章探讨了其他中国古代小说在接受过程中的“误读”现象。

这些关于古代小说接受过程中“误读”现象的讨论也大体反映了古代文学作品“误读”研究的基本状况,即论者只是立足于微观层面,目的只在解决一个与作品“误读”有关的具体问题。而以“古典小说名著误读现象亟待关注”主题笔谈及《〈红楼梦〉的现代误读》^⑤等为显著标志,则显示有学者已开始自觉地将“误读”研究作为对古代文学学术史进行思考的一种基本方式来对待。“古典小说名著误读现象亟待关注”(笔谈)是《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刊发的一组文章,主要讨论古典小说名著《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的“误读”问题,这些文章尽管讨论的还是具体的“误读”现象,但该选题的策划则是主持者对20世纪中国文学学术史进行自觉的总体思考后的结果。该选题主持者陈文新先生指出:

20世纪的中国文学研究,有两种倾向值得注意。一种是王瑶等学者所强调的,

① 刘学明:《〈水浒〉与〈水浒〉的误读》,载《湖北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刘书成:《时代的错位,荒谬的误读》,载《社科纵横》1995年第3期。李友桥等:《〈水浒〉:被误读的文本》,载《湘潭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6期。尹缉熙:《金圣叹“独恶宋江”论》,载《船山学刊》2005年第1期。张同胜:《关于〈水浒传〉误读误解问题的探讨》,载《水浒争鸣》(2009年)第十一辑。

② 白盾:《误读红楼二百年》,载《黄山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李根亮:《清代红楼戏曲:文本意义的接受与误读》,载《武汉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王薇:《“他者”眼中的怡红公子》,载《明清小说研究》2007年第2期。王燕:《宝玉何以被误读为女士》,载《齐鲁学刊》2009年第1期。

③ 欧阳健:《“讽刺”与“谴责”的错位与误读》,载《厦门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陈尚敏:《〈儒林外史〉与科举:误解及其他》,载《中国古代小说戏剧研究丛刊》(2008年)第六辑。

④ 王立:《中国古代海外传说误读的文化成因》,载《大连海事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王洪泽:《“神化”的实质是“误读”——对〈镜花缘〉中妇女观念的再认识》,载《宜宾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吕贤平:《论论语堂〈中国传奇〉对古典小说的“误读”及所蕴含之思想》,载《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邱景源:《晚清“政治小说”误读现象研究》,载《兰州学刊》2008年第2期。蒋玉斌:《清代“聊斋戏”对〈聊斋志异〉的正读与误读》,载《戏剧文学》2009年第10期。

⑤ 陈文新:《〈红楼梦〉的现代误读》,齐鲁书社2008年版。

一种是董乃斌等学者所强调的。王瑶先生对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给予热情洋溢的肯定，他从著述方式和研究对象的选择等方面描述了现代学者的成就。……董乃斌先生则较多强调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负面后果，他认为：20世纪的趋势是“西方纯文学观影响日大，文学的范围日益集于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四大文体，这种文学观对一般中国文学史著作的面貌有很明显的影响。但现已发现，要讲清楚中国文学，特别是古典文学，不能不顾及中国古人的文学观，不能不注重文学观念在历史中的变迁，不能简单地用今人文学观去裁剪史料（说严重些，是削足适履）”。……中国文学研究中的这种状况，无论是将其定性为“现代化”，还是描述为“削足适履”，所显示的是同一个事实：如何准确地辨别或呈现中国文学的历史面目，仍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古典小说名著的现代误读，由于它不仅在学界也在民间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后果，问题尤大。沿着上面的思路来看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的研究状况，我们发现，层出不穷的现代误读亟待清理并需要从学理的层面加以批评和引导。^①

如此一来，这篇文章也就具有了不同于一般的“误读”现象研究的意义，而是将“误读”研究放在中国文学现代学术史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尝试。之后的《〈红楼梦〉的现代误读》则承继这一思考的成果，以“误读”研究为切入点展开了对《红楼梦》研究史上重大问题、重要现象的思考与剖析，并借此观照近百年的红学史，为古代文学现代学术史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学术视角和学术范式。《〈红楼梦〉的现代误读》还显示：较之“研究综述”（或“研究述评”）的方式，“误读”研究在对现代学术史进行深入思考这一方面有着非常明显的优势，借助于这一方式，我们可以对现代学术史及一些重要学术命题作更深层次的探讨，可以更细致地展开对相关学术背景的考察及学术观点的辨析，从而揭示出更具有学术品格与意义的内容来。

二、关于“误读”

讨论文学作品的“误读”是一个可能引起争议的话题，因为这种讨论会面临一些风险。

首先，“误读”是一个接受美学的术语，依照国内对这一概念的使用习惯，通常指的是读者对作品的解读与作者的创作意向、文本的内在意蕴和艺术价值等相悖离的现象；与之相对的自然就是“正读”，即与作者的创作意向、文本的内在意蕴和艺术价值等相契合的解读。但对于文学作品来说，有时“正读”和“误读”是很难确定一个严格界限的，这预示着当指明某一解读是“误读”的时候，就有可能面临难以提供一种“正读”的窘迫。

^① 陈文新：《古典小说名著误读现象亟待关注（笔谈）》，载《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